



如今,甲骨文作为中国汉字最早形态、传统文化最早载体而备受重视,甲骨学也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我,作为一名学习甲骨文、利用甲骨文研习殷商文化的历史学工作者,与甲骨文结下不解之缘,靠着对甲骨文的学习,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的老家河南浚县过去属于安阳地区(现归鹤壁市)。1982年高考失利,我被安阳师专中文专业(现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前身)录取。当时感到很沮丧,现在想来却是“因祸得福”,家在安阳又在安阳上大学,为我较早接触殷墟甲骨文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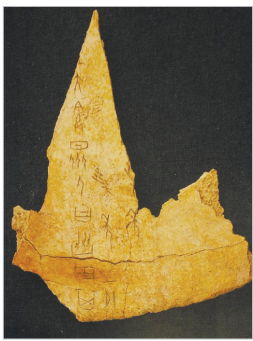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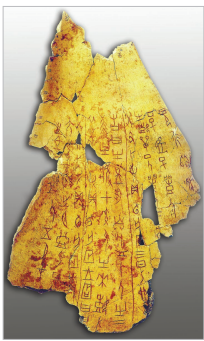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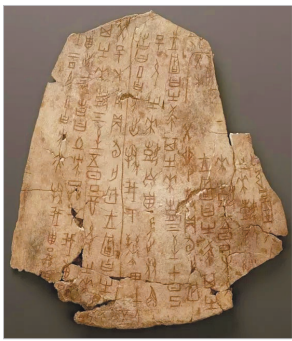
大学期间我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社团,加入学校的枫叶诗社和书法协会,开始临帖习字,学习书法。师范类学校当时都开“三字一话”(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和普通话)课程,我对习字课用功颇深,书法水平提升很快,在校期间多次参加书法比赛并获奖,尤其是1984年春天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硬笔书法大奖赛”且荣获一等奖,让我对书法习字更有信心,自信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书法家。

1984年秋,为配合“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在安阳举行,安阳市书法家协会举办了“殷墟笔会”,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笔会。虽未取得好成绩,但我顺便参观了“殷墟甲骨文书法还乡展”,还旁听了“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由此知道安阳这么一个小地方,竟然还有如此丰富的甲骨文和殷商文化等学术资源。当时安阳师专校方了解到,安阳缺少甲骨学家,从事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的年轻学人也不多,于是决定在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之际成立“殷商文化研究班”,聘请全国知名学者前来授课,为安阳市培养甲骨文研究专家。我因参加“殷墟笔会”和旁听讨论会,对殷商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便积极报名,经过笔试和面试,幸运地成为研究班的六名学员之一,从此“由文转史”,开启了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的研究生涯。

研究班暂时隶属于安阳师专学报《殷都学刊》,编辑部主任贾明刚老师兼任班主任,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殷商文化研究”专栏编辑聂玉海老师兼任学术导师,负责指导我们的学习;主编田璞老师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研究条件。学校非常重视研究班,邀请许多知名学者前来讲学上课,如甲骨学界巨擘胡厚宣先生、古文字学宗师李学勤先

我的甲骨文情缘

朱彦民



生、历史理论权威田昌五先生和《尚书》研究大家李民先生等。这些课程专业且厚实,让我们接触到了甲骨文与殷商文化研究的学术前沿。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宇信老师给我们讲甲骨文释读和甲骨学概论,杨升南老师给我们讲商史研究,这两门课的课时都比较大,我们受益最多,与他们的关系也最好。他们俩都是《甲骨文合集》(中国现代甲骨学研究的集成性资料汇编)的编辑人员,也是《合集》释文的总校释,又是组织和领导甲骨文研究及学术交流的新生代甲骨学家,人望很高。王老师后来还成为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杨老师是副会长兼秘书长。当时安阳很多甲骨文爱好者和书法家都来旁听他们的课,两位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全面了解了甲骨学的基础知识和商史研究方法。王老师还送我一本精美的甲骨文拓片集,我视若珍宝。为便于我们学习,王老师和杨老师还带着我们考察殷墟遗址,参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观看出土文物和甲骨文实物,这次研学考察让我们受益匪浅。老师们还为我们安排了殷墟考古实习,就在殷墟那条著名的大壕沟由北到南向东拐弯儿处,发掘了一座制骨作坊的骨料坑,一开始看到骨片出现,我们还以为用自己的手可以发掘到甲骨文。事实证明没有这么简单。虽然没有发掘到甲骨文,但我们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考古学知识。

研究班学习期间,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我们开始科研练手。我的第一篇论文《浅说甲骨文书法艺术》发表在《甲骨学研究》创刊号上。之后我还发表了多篇从书法角度入手的学术论文,如《贞人非卜辞契刻者》《甲骨文中的象形字》《甲骨文字的对称美》等,开启了甲骨文书法与书法史论研究的方向。研究班将要结束时,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我们一起编写了《甲骨文精萃选读》。每个学员负责一期甲骨的摹写,最终由我用楷书繁体字写出所有释文。这本书1989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后,销量大、反响好,多次加印,对我们从事甲骨文研究是极大的鼓励。

两年的研究班学习结束后,学员们被分到学校不同的岗位工作,我留在《殷都学刊》编辑部,负责“殷商文化研究”专栏编辑工作。由于专科学校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我们没有取得硕士生的学位证和毕业证,因此,大家都有考研的打算。在编辑部工作两年后,1989年,我考入郑州大学,跟随李民教授攻读硕士学位。读研期间,我参与了李老师主编的《殷商社会生活史》一书的撰写,负责其中《商代的衣食住行》一章;我的硕士论文《商代服饰研究》也顺利通过答辩,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学位。

郑州大学硕士毕业后,我又回到安阳继续做编辑,同时开始甲骨文篆刻试验。我利用篆刻基础,用篆刻刀尝试篆刻甲骨文,通过篆刻了解商代占卜机构的工作程序。我四处寻找

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真可谓“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其实,父子既可以做朋友,也可以做“兄弟”。当代作家汪曾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和《自报家门》这两篇散文中提到,他父亲汪菊生“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笛管,无一

不通”,会“养蟋蟀,养金铃子”;年轻时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也会踢足球,“还练过中国的武术”。这是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父亲,但是他并不古板,“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少发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他会“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他会为孩子做精美的荷花灯、西瓜灯,他会陪孩子一起唱戏,“还挺高兴”。当17岁的汪曾祺给初恋写情书时,汪菊生还在一旁“瞎出主意”。对于人们以之为怪的这种父子关系,汪菊生美其名曰“多年父子成兄弟”。因此,汪曾祺72岁时在散文《我的父亲》中写道:“我的童年是很美的。”他想念童年,想念父亲。

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汪菊生并没有什么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但是他培养了汪曾祺的生命趣味和家庭观念。汪曾祺深受父亲影响,对自己的孩子也非常和善、民主,给予儿女充分的自由,他的孩子、孙女可以叫他“老头子”,他亲手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汪曾祺说:“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正如现代作家冰心于《繁星·七五》诗中所述:“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每个父亲都有他的“海”,做儿女的也应该聆听父亲的“海”,因为,父亲的“海”里也有一个你。(题图摄影:刘明辉)

我是1993年初南下深圳的。

抵深的第一个周日就独自骑着单车,前往东门寻访书店。同事告诉我,深圳的书店都在那一片,一家是解放路新华书店,一家是博雅书店,后者是一家合资书店。我对解放路书店印象很浅,只记得那里人很多,挤挤挨挨的,令人呼吸不畅。这倒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这座城市读者众多而书店匮乏的状况。我在解放路书店曾淘到一本自己写的书《东方既白》,这也是我初到深圳最有趣的一个淘书插曲。很快,这家书店就被新建的深圳书城替代了,这是后话。

我对博雅书店可谓“一见钟情”:一是因为本来就喜欢书画艺术,博雅恰好是“术业有专攻”;二是这里总有一些港台地区的优质出版物;还有一条就是这里的店员比较专业,常常能够给顾客提供一些比较到位的建议。

在博雅购书,我有三次比较难忘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此偶然发现一本香港出版的《好大王碑》,我有一阵子对这个拙朴苍厚的名碑十分着迷,因一时找不到印刷品,只好从书友夏天公那里借来复印了一本,时常照着临习。我曾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淘到,不想在博雅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由得喜出望外。购回这本碑帖之后,我的临习也就跟着升级换代,把复印本用到一边去了。

第二次难忘的淘书经历,是淘得一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守敬集》。这是一部大

甲骨材料,克服了诸多困难,最终掌握了甲骨文篆刻的技巧和方法。我的甲骨文篆刻作品得到业内好评,其中一版篆刻“甲骨之王”作品还在1994年“甲骨文篆刻艺术作品国际大展”上获得金奖。当时篆刻了100多版甲骨,大多数作为礼物送给了朋友,自己仅留少数几片精品,至今仍是讲甲骨文课或作讲座时,向学生和听讲者进行现场展示的教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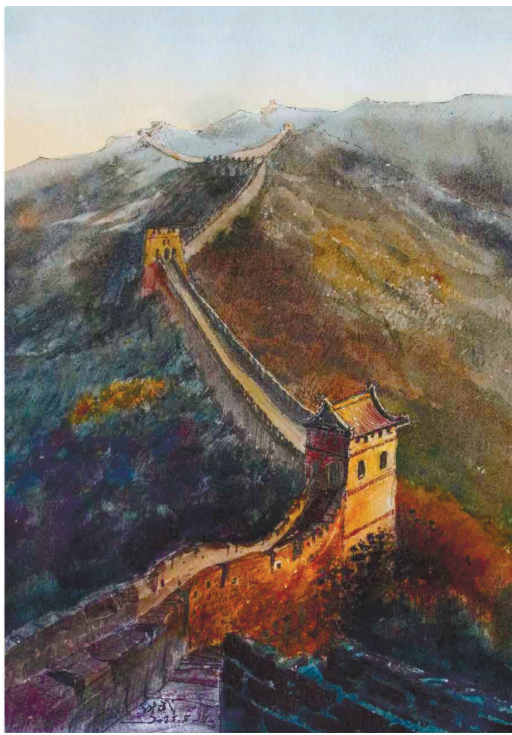
1993年,我报考了南开大学王玉哲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负笈津门,毕业后留校任教。王先生对我的论文做了很多批改,鼓励我在先秦史研究方向继续努力。虽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商代都城研究》,但后来发表的多篇论文和出版的学术专著,均为甲骨学、殷商史研究成果。比如《殷卜辞所见先公配偶考》《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明义士家藏中国文物展〉中两片甲骨考释》《殷墟都城探论》《巫史重光——殷墟甲骨发现记》《殷墟考古发现与甲骨学研究》《商代社会文化与观念》《甲骨文书法探微》《契学初曙:天津甲骨学论集》《商代中原生态环境研究》等,都是典型的甲骨学、殷商史研究成果。

到天津读书后,我了解到甲骨文发现的说法存在争议,于是申报了天津市社科项目《甲骨学在天津》,对“甲骨文发现在天津”“甲骨文收藏在天津”“甲骨文研究在天津”“甲骨文书法在天津”等相关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除了学术研究,我还在甲骨文书法艺术方面进行长期不懈的探索——将甲骨文与书法结合起来,努力探索甲骨文书法的表现形式和理论。我发表多篇甲骨文书法论文,并将研究成果汇总在《甲骨文书法探微》一书中。我作甲骨文讲座时,通常都是讲“甲骨文与书法艺术”这个题目,听众比较容易接受,更便于在社会上普及甲骨文这种古文字的相关知识。

近年来,我已举办了两次甲骨文书法展览:第一次是为迎接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的到来,2018年11月在天津美术馆举行的“殷契抒怀——朱彦民甲骨文集联书法展”;第二次是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25周年和庆祝南开大学建校105周年,2024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契文传道——朱彦民甲骨文书法展”。两次展览,收获了不少肯定,但我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我的书法水平有多高,而是我选择了甲骨文这种神奇有趣的书体,我是大大地沾了甲骨文的光。

这就是我与甲骨文的近半世情缘,我会继续坚持下去,守望这份难得的缘分。



蓟州黄崖关长城(水彩画) 叶武 文并图

黄崖关长城始建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位于蓟州区北部的崇山峻岭之巅。天津辖域内全长40余公里,因其水陆关隘、边城掩体、战台烟墩、古寨营盘一应俱全,被誉为“万里长城之缩影”。我创作的这幅水彩作品,技法上先以钢笔墨线塑形,再以水彩的金黄色暖调漫过,衬托出“黄崖虎”的奇观色彩;同时,渲染关内关外的层峦叠翠,表达历史烟云的具象,彰显民族精神的璀璨光芒。

淘书琐忆(三)

博雅书店的淘书经历

侯军

书,十六开本十三大册,每册收录专著若干种,令人对这位晚清大学者的渊博学识和勤勉笔耕的精神心生敬畏。我对杨守敬的认知是从书法开始的,尤其对其《学书述言》等论书名著早有涉猎。后来迷上淘书,才知道这位先辈竟然是访书淘书编书的全能书痴,他的《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志补》《留真谱》以及《藏书绝句》等书,堪称爱书人不可不读的淘书宝鉴。而这位爱国学人与当时的驻日公使黎庶昌一道,将多年在日本抢救性淘书所获得的国内失传的善本孤本,集纳编纂而成《古逸丛书》(共二十六部,两百卷,49册),更成为中国学者在日本镌刻刊印的古籍珍本,对保存这些中华文化典籍,使之不致淹沦,可谓居功至伟。初见《杨守敬集》,面对它的卷帙浩繁、沉重无比,我多少有些望而生畏,毕竟家中已是“书满为患”了。我打算只买其中的三本,可是店员却说,这套书只能整套销售,不能零卖。正在犹豫时,博雅老总杨国儒走过来,正在一番话令我疑虑顿消:“买书一要精选,二要买全。我们平时购书,要是不全,还要一本本给凑齐呢,你



1950年《星报》创刊几个月后,迎来梅兰芳大师到津演出,我作为报纸副主编接到采访大师的任务。记得那是初冬时节的一天,早晨8点钟,我敲开了利顺德大饭店梅兰芳所住房间之门,被他的秘书挡住,说:不凑巧,梅先生现在就要出去拜客,你改天再来吧。紧跟着就听梅兰芳在屋里面说: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坐坐吧!于是,我走了进去。

只见梅大师手上拿着一顶帽子,身上已经穿上大衣,看来确实是就要出门拜客。但他还是请我坐到沙发上,然后坐到沙发另一边语气平和地问,您有什么吩咐?我说,您在戏剧改革方面一向是推陈出新的能手,据说《四郎探母》里铁镜公主的京白就是您新创作的,结果把铁镜公主这个人物搞活了;据说原来京剧演员演唱的时候使用一把胡琴伴奏,但您在女声独唱中加了把二胡,这就优美很多。所以,我想请您谈谈戏曲改革的意见。梅大师说,这是个大题目,我是有很多想法的,好吧,我们改天再谈。然后他请我一起走出了房门。

梅兰芳和我并肩走过甬道去乘电梯,好像熟人似的,他对我说:“《星报》是新中国的新事物,一个以戏曲为主要对象、以戏曲改革为主要话题的报纸,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是期期必看。”然后,他又接着讲:“你们这个报纸引起了戏曲艺人广泛热烈的反响,过去谁给唱戏的办报啊?过去谁给唱戏的做专访啊?你们这工作做得了不起。”从电梯出来,我们并肩走出了利顺德大饭店的正门。那时利顺德大门口停的不是汽车,而是人力三轮车,三轮车夫们一下子围上来兴奋地喊:“梅兰芳!梅兰芳!”他就摘下帽子向着围上来的人们微微鞠躬,微笑着对围上来的三轮车夫们点点头,虽然不吱一声,但这个个人非常平易近人。

转过身来梅兰芳戴上帽子,我们来到利顺德大饭店的后院,这里停着一辆半新的汽车,他上车了,然后和我说:“你找个时间吧,我详谈细谈。”

找个时间?我万万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就找到了时机。当时内蒙古一文工团正在天津演出,听说梅兰芳来天津了,该团成员一致要求见见梅大师,要领略他的风度,听听他说戏。于是,我又一次见到了梅大师。

梅兰芳依旧拿着帽子,鞠完躬后说:“我生在京剧世家,但生活非常贫苦,父亲就是唱京戏的,但他没有上过妆,只是在人家宴席旁站着唱戏,结果他没唱出(名堂)来,很年轻就病死了。不久母亲也病故了,我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多亏我的伯母把我拉扯大,但她的生活也不好,从没见过手里拿过银元,只是靠缝缝补补拿个铜元。是伯母把我养大的,后来我也唱戏了,也是站在人家酒席桌前清唱,没有上过舞台,上舞台那是要靠人情面子和上台费用的,我没有。再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教戏的师傅,师傅说,这孩子扮相还不错,就让我唱一段,可我木木呆呆根本唱不了戏,师傅说,祖师爷没给你吃这碗饭,你还是站着唱戏吧!我慌了好长时间,我怎么木木呆呆?所以我和你们说,第一个是唱戏要有感情,感情来自哪里?来自你的人生抱负,再以后我在这方面确实作出了成绩,无外乎勤学苦练。后来我在上海唱红了,原来是王凤卿老师挑大梁,我是挂二牌,但他为了提携新人,居然让我挑大梁唱了几出戏,这一下子我走红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人帮人是最重要的。现在你们的处境比我那时好多了,可以很好地学习,要学会动感情,唱戏是要动感情的,我唱戏有时候就忍不住台下后痛哭,《霸王别姬》我哭过,《宝莲灯》我哭过,只有哭了,掉泪了,我才感觉这场戏演得不错。你们要把感情和角色挂在一起,这就是我说给你们的一点,勤学苦练吧!”

可这个采访没有涉及戏曲改革,《星报》主编阿英同志说,这个素材太好了,但是这个访问不能写,还是以后再说吧!所以我就没有写。那时我二十多岁,梅大师的平易近人、谦恭态度和名角风采给我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难以忘怀。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是一百岁老人了,能如愿把这个采访写下来,也是为梅大师留下一点儿可贵的资料吧!

题图:利顺德大饭店保留的梅兰芳客房(本报资料图)

满庭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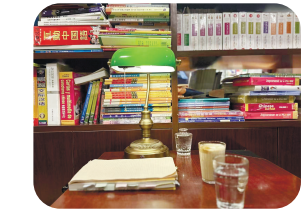
怎么能把它拆散呢?再说,这样的大部头,写书的人用尽毕生心血,编书的一班人至少要花十年心血,印这种学术书肯定要有国家补贴,印数又很少,我们博雅只进了两套,已经卖出一套,只剩这一套了。你一次性搬回家,难道不是超值收藏吗?”得,没啥说的,照单全收。

第三次难忘的淘书经历,也是看中了一部大书:朱孝臧所辑刊的《彊村丛书》。这是被誉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孝臧呕心沥血编纂的词总集。朱孝臧(1857—1931),号彊村,浙江湖州人。他精通词学,造诣渊深,时人尊其为词学“宗匠”,还有人誉其为唐宋到近代千余年来万千词家的“殿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朱孝臧评价甚高,称其为“学人之词”的“极则”。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所收录唐五代宋金元词人的总集和别集共计260卷,显见此公是寄望于这部词学巨编能够集古今词学之大成。《彊村丛书》的初刻本于1917年成书,而我所见到的则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重印本,分装为六函,每函十册,总共六十册,真称得上是洋洋大观。

我对宋词一直十分痴迷,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试着填过几十首小词,但是自感俱不足观。本想靠着这部词学百科全书式的皇皇巨著,打通词学之门径,深入词学之堂奥。孰料岁月蹉跎,多年过去,这部书却一直被我束之高阁,无暇细读,真是辜负它了!



沽上丛话



书写父亲 聆听父亲

李玉辉

《说文解字》中对“父”的解释是:“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可见,引导和教育子女自古就被视为父亲的一种天职。为人父者对子女影响深远,可不慎乎?

现代作家茅盾(本名沈德鸿)的父亲沈永锡,从小学八股,16岁即中秀才,但他却从心里讨厌八股,喜欢学习数学。结婚前,沈永锡没有钱,不能购买关于数学方面的新书,又迫于长辈的压力,只能偷偷学习数学。茅盾在回忆录里提及父亲学数学的经历——沈永锡从家中的藏书《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寻学习数学的书籍,“由浅入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一副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结婚后,因妻子陈爱珠有八百元银元填箱,沈永锡就畅想以买书、去沪杭见世面、到苏州游玩、去日本留学等,这些异想天开的想法,遭到了14岁即在娘家管家的妻子的婉劝。待到茅盾8岁时,沈永锡病倒了,但他仍然每天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学习“最有兴趣”的数学,“自习小代数、大代数、几何、微积分”。此外,他还喜欢阅读“声、光、化、电一类的书”和“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以及“留日学生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报刊”。

沈永锡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数学,是因为他认为中国要第二次变法维新,必然要振兴实业,这就需要理工人才。因此,他在立遗嘱时特别强调此点。立遗嘱后,沈永锡不再看数学方面的书籍,而是“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常常讲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强国”,还常常勉励茅盾:“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并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义。茅盾在高等小学会考时,根据父母的日常议论写成

《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一文,并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一句结尾。此文受到主考官卢鉴泉的大力褒扬:“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与热爱数学的沈永锡不同,戏剧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字景洲)则是挚爱古玩字画碑帖。读吴祖光《怀念父亲》一文,可看到吴瀛是一位“一贯热情慈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他不擅长做官,“热衷的是读书、作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吴瀛倾尽所有购买古玩字画碑帖,常常弄得古玩店的伙计“来家要账”,甚至每年“三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都有一屋子“客客气气”的伙计坐在门房里赖着不走。更甚至牵连无辜,弄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吴祖光清楚地记得:“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即使在抗战“仓皇避难入川”时,吴瀛依然看重书画等古文物,“万里征途之中他宁肯将衣物箱笥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爱的书画不辞艰难带着在身边”“到了四川之后,经过轰炸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画、古玩玉器抱回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

待到吴瀛年老因脑溢血卧床四年,再也无力保管自己的旧日文物时,他不假思索,同意了吴祖光将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的建议。吴瀛“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给国家,比

高摔下来吗?放心,我不会的!”

父亲对二娃说:“是怕把你摔坏啊!这是一层意思。”

二娃调皮地反问:

“还有哪层意思?”

父亲接着说:“你看看远处山上,那儿有许多鸟儿,天气慢慢变冷了,鸟儿们觅食也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我们在收获的季节要为它们留一些吃食啊!”

我们一帮孩子这时都恍然大悟,纷纷说:“夏天,鸟儿们为我们捉害虫;秋天,我们就得为它们留一些过冬的吃食。”

父亲点点头,接着说:“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年都要给鸟儿们留一些柿子在树上。”

父亲的话很响亮,大家都听到了,也听明白了。山上的鸟儿们也听到了。

于是,从那年秋季起,我们每年都留一些柿子在树上,让鸟儿们与我们一起分享。

留些柿子在树上

武宝生

我出生在山西吕梁山区一个叫黄土洼的小山村。记得那年,父亲在自家土窑洞旁的坡地上栽了十几棵柿子树。过了几年,每到秋季,黄澄澄的柿子就挂满枝头,成了我们小山村一道美丽的风景。

收获的时候,全村的孩子都跑来帮我摘柿子,满坡的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末了,父亲会给每个孩子分5个大柿子。

二娃是村里的爬树能手,再高再难爬的柿子树他都能上得去。所以,结在树顶上的柿子他都能摘个干干净净。

不过,有一年秋季父亲新立了一个规矩:不准摘树顶上的柿子!

二娃不服,大声说:“你是怕我爬那么

